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刻骨铭心】	最黑暗的夜晚	高 宜
【拒绝遗忘】	我的文革记忆片段	蔡 霞
【往事非烟】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三）	忻鼎亮
【青春有悔】	红卫兵这一代人	许纪霖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刻骨铭心】

最黑暗的夜晚

• 高 宜 •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地蛋——滚你妈的蛋！”

这是一段荒诞的历史，这是一段清晰的回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

（一）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是社会污染造成的。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以，人的一生，不能靠本性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维持社会公平，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时，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忏悔，而赎罪。

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

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所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

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狂热的东奔西突，忙碌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的悲惨时期。人们的良知被各种宣传口号反复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恶，正义与反动都被蒙上一层真假难辨的外

壳。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我的童年更加混沌茫然。

“文革”发生时，我正是15至16岁的少年时期。那时的我，思想单纯，简单蓬勃，积极向上。在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着。

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祖家祠堂，是明末清初叛将祖大寿的府宅，他死后改为家族祠堂，民国初年改用为中学，后来成为北京三中。那时是男校。

接着是斗争我们学校的副校长沈大逊。记住她，一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男校，除了极个别女教师外，全校一水儿秃小子。另外，沈大逊这个名字也特殊。更何况被拉上学校操场前的土台时，她是那样傲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脑袋高高昂起，让人不由想起伟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我心里不由暗暗担心，怕组织批判的高年级同学会下不来台。但我显然太低估高年级同学了。

一位高年级同学大声喝道：“说，你是什么人？”

沈大逊校长昂首挺胸，无比傲慢地大声答道：“我叫沈大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低头认罪！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了吗？”

“我没有犯罪，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绝不低头。”

台下的我们登时衷心钦佩，产生想热烈鼓掌的冲动。

高年级同学并没有被共产党员的高贵气势压倒。他们革命电影也没少看，早就没有继续跟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废话的闲情逸致。一位平时经常在学校沙坑练摔跤的同学，人高马大。他早就上台，双手交叉抱胸，站在沈大逊校长身旁。他是高年级学生组织者专门请来，对付伟大共产党员的打手。摔跤手双手交叉，站在气场十足的沈大逊校长身旁，轻蔑地低头说：“你再说一遍？”沈大逊毫不气馁，大声重复一遍：“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土台上忽然灰尘弥漫。原来，沈大逊校长话音刚落，摔跤手已经一个大背胯，把她狠狠撩起来又横躺着摔在地上。沈大逊校长浑身尘土，脑门被摔破了，黑框眼镜被摔烂，斜挂在脸上。只一跤，沈大逊校长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她竭力站直身体，大声吼：“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通，又是一声巨响，摔跤手一句废话没有，动作简单麻利。这下沈大逊校长自己爬不起来了。不知是真被摔坏了还是气势彻底倒下了。沈大逊校长浑身颤抖，满脸血污，说话的声音嘶哑了，情绪低落了。

摔跤手抓住她脖领子，就像拎起一只小鸡仔子。这一跤，把沈大逊校长的气势彻底摔出去了。她嘴巴嚅噎着，半晌没有再出声。等到她能够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到眼前那位气势如虹的英雄消失了，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丢魂落魄的走资派，一个被革命群众吓破胆的卑微渺小的叛徒。她的声音微弱，低得几乎无法耳闻：“我，我是走资派，我，我对人民有罪。我低头，我认罪……”

失望情绪登时笼罩了我们这群低年级同学的心头。本来以为能看到共产党人的英勇不屈，非常精彩，却突然变成了变节投降。我们太失望了，我们太悲哀了，我们太悲愤了。悲愤化作力量，化作高声怒吼：“打倒反动走资派沈大逊！”“沈大逊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在沈大逊身上踏一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共产党员沈大逊投降了。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投降给谁了——她是代表共产党投降了？还是代表反动势力投降了？

革命运动意想不到的顺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革命暴行的威力，无比巨大，无比威猛。紧接着，全校老师都被关起来了，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和平的，暴力的，和平加暴力的，暴力加和平的。

（二）

军训中止时，早上听到通知，吃过饭就整队出发。我们心里惴惴不安，总觉得什么大事就要发生。果然，路上就听到了确切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就要掀起高潮，北京出现了一个学生的“文革”组织，叫作红卫兵，他们揭穿了工作组的阴谋，要求我们返校，投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

红卫兵？这是个什么组织？是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气势逼人，高瞻远瞩？

一进校门，我们就知道了。红卫兵，原来是学校中的高干子弟创办的一个组织，是保卫伟大领袖、忠于伟大领袖、为伟大领袖冲锋陷阵的核心组织。这个令人产生某种神秘感的组织，和即将降临的伟大使命，刺激得我们心痒难熬，摩拳擦掌，热血沸腾。一进校门，就发现红卫兵已经正式成立，总部就设在一进大门的原校长办公室。红卫兵头头儿是高中二年级一个行事低调的军队高干子弟。他身份高贵，但很有亲和力。平日沉默寡言，遇事考虑周到，沉稳可靠。其他红卫兵总部成员，也是学校的高干子弟。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学校，竟然卧虎藏龙地隐藏着大批高级干部的孩子。加上我们这些中级或中上级干部家庭的孩子，学校里干部子弟数量相当可观，因此，红卫兵出现时，没遇到任何阻力。

由于我的家庭既是高级革命干部，父亲又因为历史问题没搞清楚，因而算不上纯粹的革命干部。所以，能否参加红卫兵，我的身份有些尴尬。但那时候，红卫兵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虽然威力强大，却毫无管理可言。那位出身军队高干的高年级同学，红卫兵总部的主要负责人，平素就认识我，几次行动都积极安排我参加。我就这样妾身不明地参加了各种红卫兵活动。那时我感到投身在伟大的阶级斗争中，为保卫毛主席而战，很正义很光荣。

在红卫兵出现的初期，辩论是红卫兵的主要任务。辩论的内容围绕着那幅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一天，红卫兵总部忽然召集我们集合。原来，东城区一间中学，红卫兵组织受到反动分子攻击，需要我们前往支援。我们火急火燎地组织好队伍，紧急出发，很快就赶到那所学校。原来，那所学校中的干部子女人数很少，全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同学都是工农家庭出身。虽然他们出身“红五类”，但他们反对由干部子女发起并作为领导核心的红卫兵组织，也反对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说起来人家也没什么错啊。他们的老子虽然不是革命干部，算不上英雄，但人家是工人、农民，也是革命事业依赖的重要力量啊。所以，人家不服。为什么你们干部子女可以组织红卫兵，还当仁不让地充当红卫兵的主人？工农子女为什么就不能组织红卫兵？情绪所致，他们对那个对联极其反感。

辩论正在各个教室分开进行着。该校邀请我们前来支援的个别干部子女，带着我们与那些反对对联的工农子弟学生激烈辩论。其实，那时辩论的论点本身就含混不清，谁也难以把话说

明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辩论忽然变成了一边倒。因为我们学校大批红卫兵前来支援了，该校原来处于劣势的干部子女忽然士气大盛。很快，支持对联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带领我们前来的该校干部子弟，和我们一起，把反对对联的同学挤到墙角。一开始还是口头辩论，只是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后来，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了一声：“打死这个资产阶级狗崽子！”许多拳头举起来，向墙角的同学猛捶。拳头上面，还出现了皮带挥舞的影子。混乱之中，耳中再也听不到辩论的声音了，而是反对对联同学的惨叫声。不知道是谁，把一根皮带塞在我的掌心。我心里想着能打人吗？但想到这是革命立场问题，是对领袖忠诚的问题。再说，皮带在手，情绪激昂，不由自主两皮带也抽了下去。这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第一次尝到武器批判的威力。

那天，我抡起了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怒火与威严。但我的皮带并没有落在反动分子的脊背上，并没有打在“地富反坏右”的身上，而是落在一个素不相识，刚才还跟我握手，双方决定通过辩论以理服人的同学的头上。他的罪过，仅仅是不同意一副对联，仅仅是不能接受高级干部的子女独掌“文革”红卫兵大权。

只有打下江山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才能算是英雄。那些工人、农民，即使帮过革命的忙，即使对革命事业充满同情并给予最大支持，拍拍脑袋夸赞他们几句可以，但让工农以及他们的子女接班掌握政权，那是绝对不能够的。他们只是革命的群众，永远也别想当革命的领袖、英雄和主人。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支援北京芭蕾舞学校红卫兵的行动。北京市芭蕾舞学校，是一所纯粹艺术类的院校。学校中艺术气息浓厚，革命气氛自然低落。该校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势单力薄，向我们学校请求支援。时间尚早，红卫兵总部还没来几个人呢，我们七八个红卫兵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坐落在陶然亭公园北侧，在一座安静优雅的小楼内。我们到达后一看，果然形势严峻，气氛紧张。芭蕾舞学校的大楼内部，有一个大厅。该校学生们都聚集在大厅对面一个转弯楼梯上。漂亮娇嫩的女同学坐在一层一层楼梯的石头台阶上，沉默不语。而男同学则站在楼梯前，手挽手站成几排，显然在保护身后的女同学。男同学们身材笔挺，脚步不丁不八，标准的芭蕾舞男主角的姿势。就这样，这些反对对联的芭蕾舞校同学与该校为数不多的红卫兵支持者对垒。我们的加入，使得芭蕾舞学校红卫兵成员增添了巨大勇气。虽然如此，我们都没有发动进攻的力量和想法。现场一片沉寂。芭蕾舞校的学生显然在防范我们的进攻，但我们只是来辩论对联的。

对峙只维持了几分钟，楼门外骤然而起的喧哗声，提醒了我们，对方大批援军到达了。不知道哪个以工农子女为主的中学的学生，大张旗鼓，排着整齐的队伍出现了。芭蕾舞校的学生受到鼓舞，向前挤来。我们几个人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很快撤到楼外，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外地势稍高的地方站住脚跟。外校学生蜂拥而至，很快就把我们这十几个人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处于劣势，但仍顽强地与包围我们的外校学生大声辩论。大家在高声辩论着对联，但对面学生似乎对对联毫无兴趣。他们只顾起哄般地向向前拥挤，如同洪水冲击着堤坝。我们心中充满了悲愤，眼前的情景，多像电影里出现的五四游行的场面啊。悲壮，激昂，壮烈。对面学生有人不耐烦了，伸胳膊打人，脚下也有人使劲踢。我们手挽手站成一圈，抵挡着学生的进攻。耳朵里乱哄哄地充满了叫喊、怒吼和我们高唱《国际歌》的雄壮声音。

这时，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所有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周围安静异常，大家都抬头看。芭蕾舞校三楼的一扇窗户，砰的一声被人从里面用力推开了。窗口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芭蕾舞

男演员。男演员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眉目清朗，雪白的衬衫，衣扣全部敞开，露出宽阔的肩膀和发达的胸肌。他显然经常扮演王子的角色，形象非凡，气质逼人，充满自信。他双手叉腰，立在三层楼窗口前，居高临下，兴致勃勃地俯视我们。看到我们被围攻的惨相，他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一连串气势豪爽的哈哈大笑。笑声是那样欢快，那样愉悦，那样得意扬扬，又是那样震撼，声浪震得我们耳鼓嗡嗡作响。

这一幕可惜不是出现在芭蕾舞舞台上，不是出现在记录历史一刻的纪录片上，只是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山呼海啸，直至今天。

（三）

对联辩论只维持了短短数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站了整整一夜，终于见到伟大领袖本人现身。他身穿草绿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西侧高高的城楼上，居高临下，向我们挥手。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一幕，宣布了红卫兵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对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

领袖一句话，掀起了红卫兵打人杀人的暴力狂潮。

北师大女附中因此改名为要武中学。要武中学女红卫兵的暴力，当时在北京的中学中是出了名的。她们最早打死了自己的校长。“文革”初期，北师大女附中打死的人是破记录的。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情。我们学校附近的北京女三中，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三中的红卫兵女战士打人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残忍的男性。女三中德高望重的校长就是被她们活活打死的。

为了报复工农子弟对革命对联的冷漠和反抗，红卫兵小将把周围胡同的“小偷流氓”全部抓了起来，拷打和审讯。校园里充满了小偷流氓的哀嚎声。被抓获的小偷流氓，几乎百分之百是工农子弟，或城市市民的子弟。许多被打死的小偷流氓，甚至不必通知家属，直接被卡车拉出去火化了。拉出去的尸体，无一不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红八月”堆积的尸体中，有校长，有老师，有地主、资本家等，也有周围胡同里所谓“小偷流氓”的工农子弟们。

各校红卫兵战士，手捏皮带，寻找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最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他们不是还活着吗？他们的家还在，财产还在，他们的子女还在，气势还在。名义上，打出的旗号是破四旧，立四新。

其实，很少有红卫兵成员能具体说出四旧是哪几项，四新包含什么内容。红卫兵的眼中，只有蠢蠢欲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需要消灭的阶级敌人。

当时，最经典的红卫兵形象，是一名剃了光头的妙龄美少女红卫兵。她手拎彭德怀皮带，脚下跪着一个脑袋开花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鲜血横流，丢魂丧胆。所谓彭德怀皮带，就是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五十年代，解放军史上第一次对解放军军官授衔时，给少将以上的军官配有水獭皮帽，呢子军服，皮靴和极宽的牛皮皮带。这种牛皮皮带是仿照苏军制式。皮带既宽且沉，顶头的铜扣粗大坚硬，棱角尖锐。据说，当时有女红卫兵抡起彭德怀皮带，只一下，铜扣落下，地富反坏右分子头骨破裂，当场死亡。由此可见这种皮带威力之巨大。

与继续不断落网的小偷流氓一起，押送进学校红卫兵总部受审的灰色身影变得苍老落魄了。

很多已经无法自行行走，需要像拖死狗一般，被两个红卫兵拖拉着去审讯。

我参加了捉捕小偷流氓的突袭。天色昏暗，红卫兵突然集体出动，按照已经核实的地址，撞开房门，直接进屋，把小偷流氓从被窝里抓出来，送到学校拷打鉴别。小偷流氓的名单，大部分都是当时所谓的街道积极分子提供的。

（四）

一天下午，红卫兵总部接到消息，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夫妇，半夜三更偷偷把大量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周围群众怀疑，今早终于被揪出来了。那个临时设在地主兼资本家家中的据点急需支援。当时我正好在总部附近，高年级学生的总部负责人招手叫我过来，临时组织几个红卫兵，由我带领，紧急奔赴那个据点支援。

地点离学校不远，在只隔几条胡同的福绥境一带。据点已经被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占领了。我带着几个红卫兵，作为支援，正式加入她们的行列。

夜色昏黑，院子里灯光阴暗，墙角跪着两个老人。他们已经经受了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的轮番拷打，似乎也不需要继续审问了。昨晚，两个老人试图把几百个袁大头银元和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这个愚蠢的行为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了邻居的注意。街道妇女立即报告附近的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组织。

老人的家被封锁了，两个老人已经遭受了一整天的拷打，但他们什么也不肯说。我们的到来，按照程序，应该再次审问两个老人。但我觉得与其继续审问，不如仔细搜索。老人的院子不大，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四间大瓦房，显示着这家主人的阔气。院子靠东北角有一间角屋，里面叠放着两口巨大的楠木棺材。城里人很少能看到棺材。这两口漆黑的大棺材，不但令人恐惧，而且也增添了阶级斗争的阴森气氛。经过仔细搜索，很快在西屋一口大缸中，发现一个沉甸甸的布包袱，打开一看，竟然是白花花的银元。经查点，竟然有1350块之多。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巨大收获，我们可以雄赳赳气昂昂返回学校了。但如何处理这两个老人呢？地富分子必须遣送回农村老家，具体程序，需要与当地派出所详细协商安排。为此，我们当晚留了下来，躺在乱糟糟的屋子里，马虎眯一觉，计划第二天撤离返校。但第二天，天色刚蒙蒙亮，我忽然被一阵叫喊声惊醒了。

是隔壁邻居。原来，隔壁院子里，也有一家是大资本家，过去是白塔寺西药店的大掌柜的。邻居叫喊，是因为怀疑这个掌柜的妻子可能出现意外了。我一跃而起，跑到邻院。也是位于四合院东北角上的一间小屋。按情况看，这个过去白塔寺药店的大掌柜可能已经被革命群众没收了财产，所以他和妻子两个人才挤住在院角的小屋里。邻居说，老头早就病了，半身不遂。问题是他老婆很年轻，本来每天大早都要起床倒尿盆。今天却不见女人的身影。邻居觉得情况不正常，高声喊女人的名字，屋里没有答应，只听到老人咿呀的声音。

我过去拉门，里面被拴住了。仔细看，栓门居然只是一根布条，招呼邻居拿来把剪子把布带剪断。门推开，一股浓烈的臭骚味，把我熏得退了一步。我指挥这个院的两个年轻工人进屋看看情况。他们刚一进去就大声喊，不好啦，女人自杀啦。

我赶紧让他们把女人拖出来。两个青工拖出来的是个年轻的女人。我当时只有16岁，她应该也就20多岁，到不了30岁。她竟然是屋里那个半身不遂，五六十岁年纪糟老头儿的妻子！

女人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了。院子里的人围着七嘴八舌，有人建议拍后背，有人建议灌凉水。我觉得这个女子是服药自尽的，灌水应该是良策。赶紧招呼人端过来一铁勺清水，照女人嘴里灌了下去。过不多时，女人吐出很多白色的液体。这时又有人说，女人肯定服安眠药自杀了，这种情况应该赶紧送医院。我没顾上考虑阶级立场问题，满脑子是救人要紧。忙招呼找来一辆平板车，找人蹬着就往附近的人民医院送。很快到达了医院。这时医院也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急救室楼道里挤满了人。一个医生模样的人迎过来问：“什么出身？”帮助蹬车的邻居不敢胡说，忙答道：“资本家，是自杀。”医生大手一挥说：“赶快拉出去，我们不给资本家看病。”

我一看火了，刚挺胸上前，医生断喝：“什么出身？”我火不打一处来，大声回答：“红卫兵！”医生顿时气馁，低声说：“我们，我们不给资本家治病。”我高声喊道：“废什么话，老子是红卫兵，让你治你就给好好治！”医生一声也不敢吭，赶紧指挥把病人往急救室里送。

从辩论对联开始，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了。病人有了安置，神经立刻放松下来了。我家就在马路对面的胡同里，昏头昏脑回到家，吃饭睡觉。这一睡就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回到医院，却发现女人躺在医院走廊里的一张病床上，好在还挂着滴液的药瓶。我过去看时，发现女人的母亲已经来了。她告诉我，女儿已经没有呼吸了。叫过来医生，医生简单看一眼，大声宣布：“已经死了，拔管子，拔管子。”

16岁的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已经死了拔管子”，只好听任医生安排一切善后。女人的母亲居然找来一辆出租车。那个时候，我从来没听过世界上居然还有出租车这回事。这是一辆当时非常时髦的华沙牌小轿车。汽车后座上还铺着雪白的针织纱巾，司机唯恐死人把车弄脏。我吼了一嗓子：都什么时候了，先把人放上去再说。

第二天，街道已经安排妥当了女人火葬，也联系好了把半身不遂的资本家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的事宜。我例行公事过去检查一下老头的情况。小屋臭气熏天，呛得人根本无法接近。我捂着鼻子过去看了一眼。我看到，屋里有半间屋子被一个木板搭成的床占据了。床上，臭烘烘地只有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在屎尿中翻滚，老头嘴里发出呻吟声，如同一头受伤的牲口。

我不知道街道最后有什么神通，居然把半身不遂、浑身屎尿的老人弄上前往农村老家的火车。事后细想，那个女人肯定是老资本家生病以后，才从乡下买来的小女孩。说是娶为妻子，其实只不过是让女孩子当用人，伺候这个半身不遂的病人。农村女孩没见过世面，看到外面闹红卫兵，又宣布把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去，一时害怕，服毒自杀。如果不是我，她连起码的抢救都得不到。而过分年轻的我不懂得必须在医院守候，以防医生对病人置之不理。我的争取，使得她得到初步救治；我的无知，却终于没能挽救回她年轻的性命。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她没死，即使她能陪伴半身不遂的丈夫返回农村老家，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那个世道，也许，服毒自尽，对于这个涉世不深的农村女孩是最好的解脱。

回到驻地，幼儿师范的红卫兵负责人告诉我，在后面一条胡同，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官僚资本家。那个官僚资本家早就死了，家里只留下一个女人。说他是个大官僚资本家，你最好去他家看看相册，那里有几十张丧礼场面的照片。规模那叫一个大，人数那叫一个多，如果不是身份显赫，如果不是家财万贯，哪里能有如此场面？哪里能有如此气魄？

幼儿师范红卫兵的介绍煽起了我的好奇心。三脚并作两步赶过去，翻开相册，真猛吸了一口凉气。好大的气势，好大的规模，好高的规格啊。几百人排成四列纵队，护送着一个由马车拉着的巨大灵柩。灵柩有一座房子那么大。灵柩上覆盖着黑色的幕帐，幕帐边缘是雪白的流苏。

队列前面是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乐队。灵车后面引领着一个高级轿车组成的长列。轿车有十几辆。这种规模的送丧队列，过去就是从书本上也从未见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家庭。

大官僚家里只剩下一个肤色白皙的年轻女人，这是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的遗孀。现在想，那位遗孀顶多也就是30多岁。大官僚资本家死于新中国成立前，十几年前的这个女人恐怕仅是个十多岁的少女吧。

女人一声不吭，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在红卫兵的眼里，象征着坚持顽抗和冥顽不化的反动立场。幼儿师范红卫兵已经把她毒打过好几次了，她还是不开口。其实，即使开口，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一看，除了搜查，也没别的事情可干了。我把人手分配一下，在这个院子里展开地毯式搜索。这家的院子好大，几十个房间，包围着一个大花园。那个年代的北京城，除了王府和高级干部家庭，带花园的房子凤毛麟角。终于，我在院子角落一个落满灰尘的屋子里，找到一口大木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一卷一卷全是图画。我打开几卷查看，都是花鸟山水。一边检查一边往院子里扔。忽然，我眼前一亮，终于找到宝贝了，箱子底部并排放着两把带刀鞘的日本指挥刀。

我们大喜若狂，收获巨大。作为初中学生的我们不懂艺术，不懂绘画，也不了解这种日本指挥刀，有可能是这家主人在抗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我们仅仅想到，这两把日本指挥刀，就是反动分子反攻倒算的武器，是反革命的罪证。所以，这两把指挥刀，后来出现在北京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上。

（五）

这个重大发现，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我带来的红卫兵，主要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们，纷纷涌上前去，把女人围在脚下，皮带像雨点似的抽打在她瘦弱的身上。我沉浸在巨大收获的喜悦中，没有参加这次毒打，也没有去阻止。我怎么可能去阻止呢？重大的战果恰恰证明敌人的猖狂。红卫兵战友的行为，在那个时候是绝对正当的。我没有动手去打人，主要因为那是一个女人，而且，从小我就不是爱打架的孩子。

这个家抄完了，附近的街道妇女不断赶来报告。又发现了诸多资本家、地主、旧官僚住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需要我们挨户去抄，支持群众挨个去批斗。但下一家，我不但毫无成就感，而且备感疑惑。

这是一个民国时期旧县长的家庭。旧县长看样子年纪并不大，四五十岁左右。现在回想，抗战时期他顶多十几二十岁，比我们“文革”时候大不了多少啊。但那时我们只知道，“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

他家的房子不大，一家人挤在三间平房里。翻箱倒柜，我只搜出一枚老式的金戒指。当时不懂得贪污，更不会贪污。戒指放进兜里，自己还嫌太脏，到了学校赶紧掏出来，放在红卫兵总部的办公桌上，就像把一个脏东西丢掉了。但也有贪污的红卫兵。我认识一个人，在抄家运动结束后偷偷告诉我，他贪了一个小金片，后来请家里一个亲戚帮忙，把金片卖了，得了38元钱。那个时候，38元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抄完家，到院子里审问旧县长。此人灰不溜湫，不显山不露水，从他嘴里也找不出什么具

体罪证，打他肯定是不值得。有人在院子中间点起一堆火，把搜出来没用的东西，尤其是书籍一类扔到火里焚烧。当一本书扔进火堆时，旧县长忽然蹦起来，伸手把书抢了出来，扑灭书上的火苗，手熏得漆黑。

两只皮带同时挥向他的脑门儿。旧县长抬起头，我们却发现他淌血的脸庞上泪流满面。再仔细看 he 手中的书，居然是一本被烧掉一半的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由于是旧版竖排本，我们居然没人注意到这是一本毛主席著作。

“夺过鞭子揍敌人”是我们接受的一种阶级仇恨教育，从学雷锋开始就立誓“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带着这种被灌输的仇恨，当天晚上，我第一次怒不可遏，动手用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一次人。

这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那天晚上，一群工人对他父亲召开现场批斗会。他父亲跪在院子的石板地上，身后站立着两个手握皮带的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前面是参加控诉会的工人。工人发言，声泪俱下，女红卫兵根据群众激愤的程度挥动手中的皮带。皮带重重地抽打在资本家的后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就在这时，院子角落的厕所发出一声威胁的叫喊。叫喊声吸引了我们几个百无聊赖的男红卫兵。原来，资本家的儿子不知何时钻进厕所，把门锁上，任凭押解人员怎么威胁，都不出来。我们几个冲过去。我看到厕所门上面是一个窗户，一窜身，跃上窗户，伸头向里张望。但刚一露头，我就浑身一机灵，跳了下来。厕所里面，狗急跳墙的资本家儿子正举着一只大铁锹，做出要给我一下子的样子。现在想来，他很可能只是太紧张，太绝望。顺手抄起铁锹来吓唬我一下。但在阶级斗争神经质的年代，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儿子胆敢用凶器威胁红卫兵，这不是反革命分子企图翻天的巨大罪行又是什么！

终于把资本家的儿子从厕所里擒了出来。几个男红卫兵把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由于受到他的攻击，我满腔阶级仇恨，怒火中烧，抡起皮带，劈头盖脸一顿狂抽。前院批斗现场，资本家被女红卫兵抽得血肉横飞，大声哀嚎。后面是我抡动皮带，皮带抽在皮肉上的声音清脆响亮。但资本家的儿子十分坚强，连续抽了十几皮带，他竟然梗着脖子，一声不吭。这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青年，身材微胖，皮肤白皙。如果在校园里，他也许能成为我的哥们儿。但那时他成了阶级斗争的敌人。他的坚强，使得我气馁，我放下皮带，一时间感到不知所措。8月以来的这些天，我亲眼见到武力行凶的奇异功效。但现在，我的武力怎么毫无作用？

那段时间，白天，学校操场举办各种活动。一次路过时，我偶尔看到，体操台上，竟是一个平时跟我特别要好的同学。他是初中二年级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跟他交好，是因为我们都喜欢无线电，但他爸是个资本家。这天，他在操场前面的台子上，做出一种非常怪异的动作，身体力行地讲述对联对他的教育：“老子反动儿混蛋，确实，我承认我是混蛋，但是，我不愿意做混蛋……”

那个大官僚资本家的妻子娇小白皙。现在回忆，应该长得很漂亮。只是那时候，地主资本家在红卫兵面前都灰头土脸的。加上我们心中已经把他们设想为牛鬼蛇神了，从来没注意过他们长相美丑。我也从来没听过她说话是什么声音。几天以后，北京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告诉我，那个女人在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打死了。女人始终保持沉默，即使在万人斗争大会上，也一言不发。她跪在台上，身后两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工人，人手一个巴掌宽的长皮带。两个人轮流一下一下猛力抽打。皮带打在后背上的声音砰砰作响。但女人既不哀求，也不喊疼。她一声不吭，直到打手们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柔弱的女人毫无动静？难道她麻木了吗？翻过来一看，女人早没气儿了。

那天晚上，带着好奇，我再次进入女人居住的院子。天色微黑，院子里灯火寂寥。昏暗的灯光下，幼儿师范红卫兵的负责人带我走到花园深处的一个假山前面。地上扔着几张散乱的报纸，女红卫兵用脚把报纸踢开，下面是浑身滚满泥土的女人娇小的尸体。

（六）

第二天傍晚，回到据点，远远就听到院子里传来高亢的叫骂声。进去一看，是幼儿师范女红卫兵正对着一个北京41中红卫兵在叫骂。一问才知道，这个41中红卫兵原来是个冒牌的。其实，他只有小学六年级，由于长相比较成熟，冒充41中红卫兵加入了我们，我们居然毫无察觉。

这个小子冒充红卫兵也还罢了，但他居然从那个大官僚资本家的家里偷了十几张侨汇券。那个时候，海外华侨回国，可以凭侨汇券到友谊商店购买各种市面上见不到的商品。这两条罪状还不算，这个混蛋居然还对大官僚资本家的老婆耍流氓！

说起来，这个小男生确实够早熟的了。我们当时，无论是出于阶级立场还是成熟程度，根本没注意到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年龄。至于美丑，更无人留心。但这个小学生居然留意到这位遗孀是位小家碧玉模样俊俏的年轻女子。并且，在批斗会的前一晚，趁院子里没人，竟然让那个女人脱光衣服，打着阳伞，在他面前表演走路！

幼儿师范红卫兵是怎么掌握这些证据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几条罪状，都是当时纯洁的革命青年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忍受的。简直罪大恶极！作为现场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我觉得这个混蛋算是把红卫兵的脸丢尽了。想也没想，就愤怒地抄起一条皮带，没头没脸地狠狠抽了他几下。我仍然觉得不解恨，但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拦住我，说，算了吧。你打人就跟挠痒痒差不多，还是让我们来吧。想想女红卫兵这些天打人的威猛，我心说，看她们打这个混蛋也照样解气。幼儿师范女红卫兵首领当场宣布，这个冒充红卫兵的流氓份子必须被打死，否则，无以平民愤。这个说辞，是当时打死人之前必须要照本宣科宣布的。

打人没我的位置，我自告奋勇带人去找他的家人。我带着自己学校的两个红卫兵去那小子的家。刚走出院门，其中一个红卫兵忽然说，你们俩去吧。我看着那小子就气不打一处来，非打死他不可。他留下来加入审讯，我们两个人就出门去假红卫兵的家。

到了他家才知道，这个小男生家庭竟然是革命干部。他父亲是个局长，妈妈也是一个机关干部。他冒充红卫兵，仅仅因为当时小学还没有红卫兵组织，为了参加革命行动，他只能冒充初中生。但问题是他还偷窃，耍流氓，这个罪过，可不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可以替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啊。

孩子的母亲，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干部，和孩子的哥哥，一个戴黑框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回到审讯现场，去证实那个孩子的身份。同时，聆听对他的最后判决。

回到院子，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本来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院，四栋高阶大屋，加两个角门的建筑格局。小院地面青砖墁地，屋前石阶高大，宽门大窗。但现在，北房的石阶上，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火炉上支架着几根炉条和炉铲。炉子前的砖地上，那个小学生已经被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三角裤衩。他赤身跪在砖地上，双手被牢牢捆绑在背后。他的身后，照例是两名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此时，女红卫兵手中握着的不是普通的皮带，而是由四股橡胶电线编成的像棍子般粗细的鞭子。这种皮鞭，外皮是电线的胶皮，内部却是电线的粗铜丝。这

个很容易造成内伤的皮鞭还不够，在每位女红卫兵的身旁，还各放置着一个盛满水的脸盆！外胶皮内金属的鞭子已经足够致命了，还要在鞭子上蘸水抽打。她们从小就知道，敌人对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火炉加皮鞭的，现在学过来“报仇”了。

母亲和哥哥站在跪着的孩子身后。母亲抽噎，即使想装样子表态，也说不出话来。因为，幼儿师范红卫兵负责人刚刚对他们宣布了罪行，并且，宣布了人民对罪犯的最终判决：“死刑，今晚必须打死。明天早上你们来收尸！”

哥哥满眶眼泪，但他终于控制住悲憾，声音颤抖地代表母亲和家人表态：“红卫兵小将，我们全家都支持你们的判决。我弟弟自绝于人民，不得好死。红卫兵打死他应该，红卫兵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都支持。”

一家人是怎么走出院门回家去的，我已经无从得知了。因为，几日来的劳顿使得我精疲力竭，严重的缺觉令我大脑昏昏沉沉。我一句话都没说，进到西边的屋子倒头就睡。

忽然，一声畜生般的惨叫声把我从深沉的睡眠中惊醒了。我惊恐地睁眼，四周一团漆黑，只有窗纸透过来院子里的灯火。我回忆起，原来我睡在据点的一堆乱被子中间，而院子里的审讯正在进行。刚才的惨叫，就是那个冒充红卫兵的小学生发出来的。我摇摇晃晃地起身，到院子一看，原来，刚才是我校那个留下来加入审讯的红卫兵，用炉子里烧红的铁铲烫犯人的后背。而在火烫之前，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已经用浓盐水在他伤痕密布的后背上使劲儿刷过了。

如果不是这种临死前的哀嚎把我惊醒，今夜的审讯其实才刚刚进入高潮。我从来没见过过如此残忍的酷刑，我不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如此残忍的拷打！

我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我的神经不够强硬，严厉制止了我校那个红卫兵的继续烧烤。但极度的困倦使得我坚持不了几分钟，拷打停止后，我倒在破被服堆里继续酣睡。再次醒来，天已经大亮了。

我起床，院里悄无声息，推开房门，看到昨晚的狼藉还在。只是火炉早已熄灭，皮鞭扔在地上，满地都是水，但犯人和拷打者都不在现场了。终于有一个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出现了，她睡眼惺忪。我问犯人在哪儿。她指指院角那间放棺材的屋子。

我推开棺材屋门一看，犯人仍然浑身赤裸，身上只留下一条细细的内裤。他双手被铁丝牢牢捆绑，铁丝又被一个粗绳子与支撑棺材的地脚支撑木结实地捆在一起。我心生一股寒意。这个孩子眼看气息奄奄了，还这么狠地拴他干吗？难道他能逃跑吗？

虽然是我校红卫兵的临时负责人，但这些天我一直听任幼儿师范女红卫兵的指挥。但现在，我吼来那位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负责人，让她把捆绑双手的铁丝解开。费了半天劲儿，铁丝终于解开了。铁丝上鲜血淋淋，我看到，铁丝早已经深深嵌入手腕的肉中了。

我喝令犯人站起来。他摇摇摆摆往起站。我想伸手去搀扶，但犹豫了一下，打消了念头。我让人到胡同里找电话。既然这小子冒充的是41中的红卫兵，就让41中来处理这件事吧。我隐隐约约觉得幼儿师范女红卫兵还没罢休，拷打还会继续。想起前晚在不远的院落角落里那个寂寞的年轻女尸，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觉得还是别再打死人了。

只过了十几分钟，41中派来一辆平板三轮车。没人搀扶，一缕生的渴望支撑着犯人，他摇摇晃晃地自己走出院门，爬上平板三轮车。三轮车蹬走了，我转身进院。后来得知，平板三

轮车刚刚移动，犯人便昏厥过去。4 1 中红卫兵毕竟理性，来不及请示，直接把犯人送到附近的人民医院。幸亏交接时我交代了一句，这小子可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医院接受了病人。当场进入急救室，经过了不知多少轮紧急抢救，这小子接着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足足躺了将近半年时间，才度过了危险期，保住了一条性命。

由于本能地无法接受这种歹毒酷刑，我当天返回学校，向红卫兵总部汇报了我校一名红卫兵参与的这场拷打，说明被打那孩子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当天红卫兵总部贴出告示，宣布开除那位参与酷刑拷打的同学们的红卫兵资格。这应该说明，当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保留着一丝做人的理性。

人性的本能，使得我避免了一场杀人罪恶，拯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一年以后，“文革”运动形势趋于平缓。那个小学生通过父亲关系，终于获得了平反。当时参与拷打、审问的幼儿教师范女红卫兵，和我校那位被开除出红卫兵组织的同学，都被招去参加他的平反会议。而作为北京男三中红卫兵现场临时负责人，我却没有接获通知。我知道，我是由于一闪的善念而幸免前往了。

此后，我仍然参与了其他一些抄家活动，但大都规模很小了。

我们据点的那一对半夜偷偷往下水道扔银元的老人，不久就被遣送回农村老家了。两个老人勉强支撑到家，很快就双双离世。他们到死也没有用上早已准备好的，放在院角屋子里的一对大棺材。

离开据点前，鬼使神差地出于好奇，我亲自去西四缸瓦市的殡葬服务部，联系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火化事宜，顺便跟服务人员闲聊了几句。服务人员告诉我，最近火葬场完全忙不过来了。8 月份到那天为止，已经火化了 2 0 0 0 多具尸体。仅仅那天当天，就有上百具尸体必须火化。当天晚上，火葬场的车来了，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上已经放了 5 具尸体了。女人瘦小的尸体，在卡车上，占据了很小的一块地方。

对于我来说，抄家活动已经彻底结束。回到学校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如火如荼的“文革”活动。破四旧运动结束后，我参观了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据点。看到的是漆黑的监牢，肮脏阴森的刑讯室，还有固定在墙上的手铐脚镣。

现在很有一些呼声，希望当时参加打砸抢的红卫兵站起来，忏悔自己的罪恶，对历史负起责任。我们参与那场罪恶的朋友，确实应该反思，应该反省，应该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告诉善良的人们，告诉青年朋友，告诉后人们。让人们知道，并永远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经历了一场给无数人带来巨大苦难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场“大革命”中，虽然单纯，虽然渴望美好，但我们却用一双最干净的手干出了最肮脏、最恶毒的事情。

难道我们还能够让“文化大革命”的肮脏土壤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存在吗？

我的反思很肤浅，因为我幸免于进入地狱的罪恶。人的善良会在最关键的时候，阻止恶行。我幸运地是一个心地还算善良的少年，加上父亲还有一个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底气不那么足。可是，如果我当时彻底失去人性，如果我不自觉地被卷入“文革”的可怕深渊……难道现在不是更应把这种罪恶公之于众，让世人警醒，提高警惕，认识它的起因，不要让我们美丽的祖国再遭受这种灾难吗？

当年的红卫兵们，请你们反思，反省，反躬自问。忏悔罪行，向人民公开过往的罪恶，让

中国大地永远彻底避免这种罪恶吧。

□ 原载《我们忏悔》

~~~~~  
【拒绝遗忘】

## 我的文革记忆片段

· 蔡 霞 ·

文革开始时，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经历了当地的文革运动；文革中期，我参军到了总后第三军医大学，经历了军队中的文革时期。把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事情写下来，和大家一起反思。

### ◇ 初中生里的文革受难者

文革是一场人人遭难的浩劫，不仅老师不幸，学生也不幸。这里，我想说两桩学生的遭遇。

#### （1）一个初二男生的猝死

文革开始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我们学校是由清末状元张謇创议开办的，文革前是全省重点中学，1980年代后是全国重点中学之一。我们中学的学生，家庭出身多是两头“尖”：或者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红五类”，或者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弟。文革开始后，不同家庭成份的学生心理状态也不同。

1966年6月起，校园里陆续流传北京的各种消息，空气中飘荡着骚动不安的气息。终于有一天，高三学生贴出了这个城市的第一张大字报，革命开始了！起初，学校由全天上课转入半天上课半天运动，紧接着就停课闹革命。

“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对搞运动极为兴奋，狂热而虔诚地读社论、贴大字报、批斗老师，把这看做是神圣的革命行动，并用此来衡量自己的同学立场是否坚定、政治是否正确，而这给了当时“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极大的政治压力。“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红五类”出身同学的脸色，不敢有稍许的言行不驯。为了挣政治表现，他们被挟裹进了运动。他们被要求必须参加控诉资反（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必须写大字报，必须坚决批斗老师。这对性格开朗外向的同学来说还能应付，但对性格内向沉闷的同学就很是煎熬。

一天下午，我们初二年级各班都在开批斗会。突然，隔壁教室搬腾桌椅一阵大乱，有人大叫“快去叫人啊！”“快去校医室啊！”我们班学生呼啦一下冲进隔壁，只见一男生象一滩软面瘫在单人课桌下的空档里，他的同学正使劲往外拽他。校医赶来了，再一会儿，医院救护车来了。他班里同学说，他正在发言批判吴晗邓拓、“三家村”，说着说着没了声音，接着人就瘫下去，滑到了课桌下面。第二天早上，校长办公室里哭声阵阵，这男生的家人到学校来报丧，说他死了。死了？！我们极为惊惧愕然，昨天还鲜活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后来听他们班同学说，这男生好像出身黑五类，成绩很好，但一向胆小怕事，从不敢说不。他家人哭着告诉我们，自从班级布置他发言批判，他就连着几天睡不好觉，不知如何是好。为了写发言稿，头天晚上写了撕、撕了写，几乎一夜没睡。那天中午到家吃不下饭，又回到学校。有同学想起开会前他曾说自己不舒服，嗫嚅地央求别发言了，但没被同意。结果，居然是他死

了。

这男生的死很快被淹没在校园的“革命”浪潮里，没有谁再提起他来，大字报铺天盖地，揪斗老师游校游街日甚一日……

（2）如果不是我，也许那男生还不会被打得更惨

1967年夏天，全国各地都卷入了派别武斗，我们当地的武斗一样血腥。一派占据了城里，另一派退守到城郊。我们学校后门即是护城河，河上有一座桥，连通着市区和郊区的路。占据城里的一派将我们学校的后门修成了碉堡，日夜监视着桥和路。而退守郊区的这派则隔河布阵，伺机夺回城区。有一天夜里枪声不断，双方大打起来，后来听说那天晚上死了人。最后是城外的攻进了城里，我们中学就成了俘虏营，教室里关着城里那派我们学校守碉堡的学生。

第二天上午，我随着城外这派大队人马去了学校。为什么去，已经记不得了，但后来发生的事40多年来一直在咬噬我的内心，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非常非常愧疚。那天我路过一间教室，战胜者们正在教室里围打一个男生，男生哭叫着央求着，无处躲避。我赶紧进去劝拦，但没用。于是，我赶紧去找战胜者队伍的“头头”，他曾经作为工宣队队员进驻过我们学校。

恰好在校园里碰见了，我连想都没想，迎上去急急地对他说：“你快去看看，他们在打人，快别让他们打了。”

“打人？”

“是，打轰派学生。”（当时我们那里分成对立的两派：拥派和轰派。）

“走，看看去。”

我以为他要去制止殴打，转身加快脚步领着他去那间教室。没想到，这“头头”一进了教室就大声咆哮起来：“打！给我狠狠地打！打断他的腿！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和我们打！”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狰狞的一张脸，他的鼻子、眼睛、嘴似乎都被他的咆哮拧歪了。

“轰”的一声我象当头挨了一棒，扭头仓皇逃出教室，眼泪哗哗漫流满面，身后传来那男生撕心裂肺的惨叫。此后我一直不敢问、也没处去问那男生后来怎么样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连向他说声“对不起”都没能做到，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他长什么样，只知道他似乎是初三年级的学生。

◇ 在军队经历文革的几件事

1969年底，我参军了。接着是在部队经历了文革中后来发生的事情。

（1）“九·一三”给我带来的思想地震

文革中，邱会作当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时，1969年三个军医大学换移驻地，我们第三军医大学从重庆调到上海。相对而言，上海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最好，于是1971年春军医大学恢复招生后，不少军内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到我们医大上学，其中有一些人的爹妈是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人。9·13前，这些人俨然是“骄傲的公主”、“高贵的王子”，在学校很招摇。9·13后，连军级干部都没听到中央文件传达时，那些爹妈上了“林彪贼船”的几个学员就突然被上面一个命令悄悄地先集中起来，接着神秘地消失了。

那时我在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政治处工作，比别人听到的自然更多。9。13事件逐级传达后，我明白他们“被处理”了。他们本来和我八竿子都打不着，但作为同是军队干部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在一夜之间彻底颠翻，给我带来的思想震惊不亚于八级地震。电影“集结号”放映后流行一句话“组织靠不住”，而那时我突然感到“爹妈靠不住”。如果爹妈一摊上事，孩子跟着就遭殃。“爹妈倒台了，孩子能靠什么活？”这个问题不断地缠绕着我。自此以后，“政治太残酷，权势不可靠，靠本事活”成为我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个信念改变了我的选择，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道路。

## （2）两次全军一级战备

我在军队的10个年头，经历了9。13，经历了两次一级战备。两次一级战备与林彪、毛泽东直接相关。

1971年，我被抽到军医大学文艺宣传队，我们经常与地方群众、友军单位联欢演出。当时空四军军部离我们军医大学校部很近，那年夏天，我们在空四军军部大礼堂联欢演出。礼堂内的四周墙上高挂标语：“第七军医大学誓死与空四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注：我们当时是第七军医大学，1975年后改为第三军医大学）。9。13以后，南京军区工作组进驻军医大学，军医大学师以上干部全被集中到上海财经大学隔离审查。

据说我们那次联欢演出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勾结；墙上的标语被认定是反动标语。据当时清查9。13事件的通报说，空四军军长卷入了林彪集团，据说参与了林彪儿子林立果的“小舰队”活动。邱会作是林彪集团的“四大金刚”之一，作为邱会作的部队，我们军医大学和空四军联欢有很大的政治嫌疑。

9。13期间，南京军区工作组进驻之前，有一天突然全院紧急集合，领导宣布我们从现在起进入一级战备，所有人按战时要求打好背包，把多余衣物统一交到军需仓库保管，个人资料2小时内全部销毁，全体人员随时待命。

上交衣物简单，难在销毁个人资料。按规定所有的照片、家信、日记本、笔记本、通讯本统统都销毁，等于要把自己从一切社会关系中抹去，只剩下一个符号：战士XXX。照片，烧！信件，烧！日记，烧！工作笔记，烧！通讯本？犹豫了。一旦烧了，同学、家人、朋友，我还能联系上，而唯一担心会失去联系的是一位老外婆。掂着通讯本，我犹豫不决。

9。13前的2个多月，我一场重病，住院20多天。我的同室病友是一位上海姑娘，她外婆每天来陪护她。外婆也很心疼我，在照顾她的同时把照应我吃喝拉撒的事全都包下了。姑娘出院时我要了外婆家的地址，想请到假就去看他们。倘若烧了通讯本，以后去哪里找她们呢？可是军令如山倒，容不得我违命，我只好把外婆家地址匆匆默记在心里。

解除一级战备的第一个休息日，我请假去外滩十六铺寻找那条弄堂，但没能打听到。此后又去找了两次，都是失望而归。一定是我记忆出错了！几十年来外婆的笑脸刻在脑海中，同时刻上了我的自责和歉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告前的几个小时，中央下达了全军一级战备的命令。那天下午2点多我们接到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到位（即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随时待命；立即通知所有外出、探亲人员迅速归队。与9。13期间的一级战备不同，那次并没有要求我们销毁全部个人资料。战备动员时，首长说要严防北边苏修帝国主义乘中国人民悲痛时搞突然袭击。那时我在医院政治处工作，要汇总各单位执行战备命令情况并向上

报告。我的印象中，我们医院所有外出和探亲的人员都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部队，无一人拖延。

### （3）邓小平与人头、猪头

1975年，邓小平二次出山。他一出来工作，就搞“三项整顿”，努力恢复各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那年中央军委决定三个军医大学再次换移驻地，我们军医大学又回重庆市。重庆是国家战备计划中的三线，60年代初许多军工企业从沿海大中城市撤到这里的大山沟里。随企业内迁的有数万名职工及其家属，这极大地加重了重庆市生活消费品的供给负担，居民肉食品的供应更是严重短缺，这极大地影响了军工企业职工的人心稳定和生产积极性。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指示四川（重庆当时隶属四川）农民要多养猪，同时从外省调生猪进川，以改善职工生活安定人心。但好景不长。197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生猪进川计划据说也停了下来，重庆职工的生活刚稍有改善又再次陷入极度穷困。群众不满情绪不断蕴积，对批判打倒邓小平极为愤怒。当时有些批邓的人在重庆城里刷大标语：“打倒邓小平”，不远处另一幅标语针锋相对：“邓小平上台，千万个猪头落地，邓小平下台，千万个人头落地！”

### （4）我们医院反动技术权威的文革处境

军医大学是军队知识分子的集结地，他们大多是医学研究的技术权威，在文革中也遭到各种批斗，处境很是困难。我到医大附属医院工作不久，有一次参加全院集体劳动，我们一群人在一起边干边说笑，很是热闹，只有一个很瘦小的老头，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一角干活，没有人搭理他。我们休息、喝水，他也不走近，一整天一声不响。他是谁？我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反动军人、反动技术权威“双料货”。这个老头是原国民党少将，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的院长。国民党从重庆溃败时他没有走，向解放军投诚了。解放军成立第三军医大学后，他作为医学专家，随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一起被编进了三医大附属医院。我参军已是1969年底，文革初期的急风暴雨式的大批斗已经过去，一些反动医学权威边恢复工作边接受群众监督，一些反动权威没能回到业务岗位，继续做惩罚性的劳动。想来这个小老头是属于后者，他被罚去每天打扫医院厕所，一直到我离开部队时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恢复正常待遇。

我们医院还有一个反动技术权威，是泌尿科专家，姓蒋，待人非常和善。经过文革前期的大批判，他被半解放，即一边干业务一边接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一些革命群众故意整治他，使他的处境极难。一天院长在全院大会上愤怒大吼：“手术室护士在反动权威给病人缝合刀口时，故意拿缝合表层皮肤的线，而不给缝合内脏的羊肠线，结果这反动权威既不敢说护士拿错了也不敢缝合，只好让开刀病人敞着刀口躺在手术台上！你们这是整谁呢？！是整反动权威吗？那病人不是劳动人民吗？！你们是在迫害劳动人民！院里宣布给这护士严重警告，今后谁敢在医疗上难为反动权威，我就直接处分了他！”我的战友告诉我，院长说的这个“反动权威”就是蒋医生。

□ 原载《历史百人会》

~~~~~

【往事非烟】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三）

• 忻鼎亮 •

（上接 zk1503a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2，兰考和兰考的知青们

我正式踏上了工作岗位，处境比在农场是又好许多，“紧箍咒”似的档案在县组织部，本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的过去。我表面上是和大家一样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我还需倍加小心：不能得罪领导，不能参与任何政治运动，否则后果会比以前更惨，因为我已经没有学生身份了。那时兰考很穷，穷得难以想象，但那里的人们还是比较老实、胆小、善良，（不似现在河南专门造假的印象）处事比较实际，对政治理论淡漠。那时的大形势是文革中的一个低谷区，政治环境也稍有宽松。我被分在兰考县科委，属政府机关，没有什么太具体的业务工作，除了经常去工厂和农村蹲点外，我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也许是本性难移，积习难改，我沉积了两年的思想又被激活了。在河南的那几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结交了一批新朋友，二是读了许多书，清理了思想，写出了政论、文艺等方面的一批处女作。

我来兰考前，上海有一批知青在兰考插队，分别集中在韩村、唐寨、大付堂三个知青点。我到兰考后，不久就与他们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韩村的知青最多，以五十一中（位育中学）中四和中一的学生为主体，另外还有颇有名气的上海中串会的核心人物，市东中学的侯美度（红鸥）、复旦附中的张水荣等。我较为相知接触最多的是我的校友，比我低两届育才中学的陈韶麟。这些插队学生多数是真心诚意到农村锻炼自己的，他们平时本分地参加劳动，空余时还能认真读书，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大付堂的知青基本上都是中学造反派，持中串会观点，如管宇春、邱月芳（海鹰）等在文革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对接受再教育一类的口号内心并不认同。接受再教育态度最好的应是唐寨的知青点，他们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地学习农活，与另外两个知青点少有来往。因此，他们很快就得到县里的表彰和嘉奖。队长复旦附中的樊颂贤被评为毛著学习标兵，不久就上调参军。客观地说，这三个知青点的知青大多数都是下乡青年中的好学生，但他们选择到兰考插队都不是正常途径的统一分配，而是自己和兰考知青办联系的。个人当初的内在动机至今无法考证，但三十几个来自重点中学（大多数）的学生集中在兰考插队，已成为很有特色的事件留在了知青下乡史上。我和他们相识在贫穷落后的兰考，那时，文化沙漠似的环境和强烈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我们很快有了频繁的交往。我和他们中近三分之一的人有过一定程度的深谈，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了好朋友，交情一直保持到如今，我的老伴也是当年兰考唐寨的知青。

我在劫后余生的日子里，居然很快地结交了一些思想上的新朋友，这是得益于兰考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兰考人很穷，最关心的就是怎样能不挨饿、不受冻，对生活上能给予他们一些帮助的人都有感恩之情。比如，每次从上海回来，能给周围同事、邻居分送糖果、牙膏、肥皂等小礼品，他们就会记住这些情谊。研究社会制度、政治理论离实际生活很远，绝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关注这类人，也不会认为这类人是坏人。所以，我在兰考和一些朋友们谈论政治问题，也没有受到任何注意，我与那批知青的清淡沙龙一直持续着。即使他们尽数上调到工厂，我们之间无穷的话题始终没有中断。

与我思想上交往最多的是韩村的陈韶麟和唐寨的朱学勤。陈韶麟是上海育才中学高三学生，和我不但是校友，在文革中还有一段彼此不知的缘分。文革初期，我们中国科大几个原育才中学的校友写大字报到母校，认为育才中学的教改是修正主义的教改，校党总支和段力佩校长应对此负责，接受群众批判。此举马上受到强烈的反击，在育才中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给我们扣上放反革命邪火的帽子，指责我们是小右派分子。在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下，陈韶麟等二十三个同学写出了《谁敢灭火？！》的大字报，指出我们点的是革命之火，对我们表示了罕有的支持。我们在兰考邂逅相遇，谈起这段往事，彼此的亲近感骤增，不久就成了思想上交往频繁的好朋友。他在77年文革后首届高考考入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中文系，

79年考入本校现代文学研究生，师承任访秋先生，专事周作人作品研究。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大，在科大少年班教中文，后调至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工作至今。陈君为人坦诚，忠于友情。早在插队期间，就对鲁迅有深入仔细的研究，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买齐了鲁迅全集，并认真通读。只要谈到鲁迅及其著作有关之事，他都能详细地谈出出处和原委。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又研读周作人的作品，对周氏兄弟的文学成就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愿笔耕，述而不作，以至于他的精到见解不能问世。我们之间的交情已有四十余年，在政论、文学、社会现象等方面，我们一直延续着没有谈完的话题。

朱学勤也是当年与我接触频繁的年轻人，他现在已是赫赫有名的独立知识分子，其业绩不用我赘述了。他当年在兰考唐寨插队，和我老伴同一个集体户。他是69届的学生，文革开始时还在读小学，当时因仰慕这批兰考知青，单身一人来兰考，是这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志向高远，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读书极其勤奋，也有相当的领悟能力。开始时，他不断向师兄、学姐们学习，像海绵似地吸取知识营养，不久在见识上就有了逾越。那时我们相识了，经过多次交谈，我惊讶不已，如此年轻的上海知青居然对政治理论极感兴趣。后来，应他的要求，我和他在开封陋室里谈了三夜，详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从自身经历谈起，按我独特的理解分析整理文革的脉络的各类典型事件。朱君听得十分投入，并不时发问，许多内容他都记得很牢，多年后都能具体谈及。据说他回巩县后，曾把我的谈话内容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作了书面记录，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对文革资料搜集和研究。我们之间另一重要话题是谈《南共纲领》，学勤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在旧书店购得该书，读后十分兴奋，与我谈及此事。该书是我在68年精读并作了详细读书笔记的，我虽然当时身边已无书，仅凭回忆，我把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对他系统地讲述了下来。后来在通信中他竟戏称“忻君吾师”。现在，青蓝易位，他业绩卓著，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高论，我大概连听也听不懂了。除了这二位，兰考的知青们在文史或理工等方面做出成就的不乏其人，但他们对兰考的这段生活都觉得对自己一生有一定的价值，并没有对当时非常艰苦的生活作不堪回首状的控诉。我也同样，认为在兰考时期精神生活还是比较值得回味的，除了一批知青朋友外，我还交了一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大学生朋友，交往一直保持到现在。

3，浩劫年代读书和写作

文革后期对失落感很强的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个学习知识和提高承受力的合适空间。那时，我们正处于精力旺盛求知欲很强的时期，在一片大批判的阶级斗争浪潮中，我们没什么正经事可做，却又有大量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正是认真读书的好时光。我在兰考呆了一年多，被抽调到开封地区推广优选法小分队，不久就留在了开封地区科委。在那里，我和本单位的图书馆管理员保持了相当好的关系，我教她数学、中文和外语，（她正准备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上大学）她给了我翻阅封存禁书的自由。我如鱼得水，不但补看了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还接触了萨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热拉斯等政论和哲学著作，顿时感到眼界大开，自觉思想境界又深入了一步。这又得益于河南这样的环境，人们对我这样异于常人的举动缺少“政治敏感性”，只认为我是个爱学习的青年。经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我对许多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鉴于大学时期的教训，我又不敢与人交流，和好朋友的谈论也尽量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这样，我的思想成了一个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系统，我感到不爽，于是决定写些东西，留些作品，相信将来会有用，即便是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也好。那时，我虽然还是单身，但已有一个九平米的独立宿舍，安全尚可保证。于是，从74年开始，我笔耕不止，写出了一批仅有手稿而不能公开的作品。现在偶尔翻阅，虽然觉得当时见解上不够成熟，语言还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中的激情和敏锐仍为可贵，至少我现在是不复再有了。

第一个作品是一篇小说，题名为《经验》，写一个县级机关科研弄虚作假的事，是在我相当熟悉的领域内虚构的故事。之所以初选这一题材，是为了先练练笔头，也让我这爱好文学的理

工科学生过一把文艺写作瘾。此后，我便一发不可收，先后写了《论自由》、《李白与杜甫》、《谁之罪》等一批政论、杂文和小说。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那时写了两篇批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这是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后，并将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比较后的学习体会。我认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人的意识和事件过程都简单化了。意识应该包括感觉和思考，而思考则是决定人们行为主导因素。而《实践论》恰恰淡化了思考的功能，过多强调感觉。另外《实践论》描述实践过程过多强调了经验感知，忽略了思维和间接知识的作用，特别在知识共有的现代化社会，人们获得正确认识多数来源于学习知识，而不是亲身体验。毛的这些哲学思想正是他历来罔顾科学规律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理由。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过分突出对立统一规律，而将量质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视作其附属，这就将社会发展过程简单化，把制度的变更看作两个阶级的位置互换，这就造成他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全部。它片面地强调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斗争，无视矛盾双方存在的同一性，这就使我国长期处于斗争的气氛中，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他的内因决定论更是显得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常识，也是全国人民一直陷于无休止的内斗中的理论根基。那时，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比70年前又进了一步，当然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想法不足为奇，更何况也未必都正确，我仅想说明当时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题名为《血雨催春》的小说，它以76年四五事件为背景，主要描写一些当年经历文革的大学毕业生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反抗暴政的表现。四五事件引起我强烈的愤慨，觉得不写不足以平息内心怒火，于是我在没有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凭想象虚构了这样一篇小说。这是用血写的文章，充满了激愤，现在翻看还竟不住动情。为了安全，我的这批文字手稿在当时基本不示于人，极好的朋友也仅能看一些小说类的，如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在“四人帮”未被打倒前无一人看过。经过一次劫难，我仍然敢于如此“不安分”，是因为随着阅读量增加，我越来越感到这样的专制制度肯定长不了。一旦龙归大海万寿有疆之时，应该能看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从现在的目光看，这些文章无论是思想或表达方式都有一定的欠缺，但它毕竟是我思想变化的历史纪录。在上世纪末和前几年，有些朋友都借阅了我的这批作品，特别是一些文革研究者认为其有相当的价值。而我仅把此看作自己人生旅程的一个环节，也是我这样一个具有异端思想的人批评主流社会而发出的不同声音。

4，人生的转弯

此后，随着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我的人生轨迹出现了急转弯。接下来的生活就是重新拾起数理化，苦读外语，考回科大回炉班，交大研究生，生活节奏顿时紧张起来，精力和兴奋点又回到了我原来的专业领域。毕业工作后，因业务上逞强的欲望使我陷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必经的常规程序，集中精力不停地搞课题、写论文，为了使自己的职称尽快从中级、副高到正高一步一步地升上去，因此能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条件。对知识份子应有的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责任心却在一定程度上罔顾了，也许是心有余悸，也许是兴趣的转移，总之，我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中断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可能我有些机会可以进入体制内，这便于名正言顺为社会变革发声。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掷地有声口号的感召下，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很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倡导下，许多平民出身的年青知识分子被选入了“第三梯队”，作为新一代各级接班人培养，像我这样当过“反动学生”居然也在此列。那时，我的档案已经过两次清理（林彪事件后和文革结束后），已经没有任何一打三反运动留下的痕迹了。单位领导启动组织培养程序，派人到中国科大外调，了解我在文革中的表现。那时科大力学系当政

的是我同年级同学，他为了成全我的好事，重点强调了我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受到迫害，对我运动初期造反派的身份淡然置之，至于“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估计一字未提，就这样我顺利进入后备干部名单。那时，正值控诉文革当热时期，不少人将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痛苦浓墨重彩地上升为“受迫害”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讲述，以便积累政治资本。一位与我颇为相知的领导见我从不谈文革，曾直言相询，问我怎样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我实言相告：“我文革中被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批评毛主席。”他听后频频摇头，而后又反复提醒：不要把这话再对别人讲。说实在话，我当时对自己专业上发展甚为看好，对是否当官看得很淡，始终也不要求加入共产党。到了八九民运以后，我彻底失望，中断了这方面的任何念想。这样，由于我的不配合，仕途无望也是情理中的事，在体制内发声也就成了幻想。我退休后，逐渐淡出了专业，也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旧病复发”理所当然。但是非常可惜，在与朋友们接触中，我很快发现：由于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研究的中断，现在的认识离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的讨论已很有差距了。所以，我只能将自己在文革中思想变化的经历实录下来，希望能对文革研究和政体改革作极微薄的贡献，也了却我一生中最后的心愿。

（未完待续）

~~~~~

## 【青春有悔】

### 红卫兵这一代人

• 许纪霖 •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死存亡，又有过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

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应，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作是中国民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传的。

理想主义精神在1987、1989年都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在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速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会经验，文革时期是红卫兵，下乡受到挫折之后想办法参军、回城，恢复高考之后立马考进大学，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晋升和发财的机会。很会抓机会，非常有功利心，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先生今年发表过一篇对这代人的批评文章，标题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历数如今在学界已经成为长辈的“新三级”一代学者的种种劣行：从钻营投机到抄袭剽窃，完全丧失了领军人物应有的道德感和学术份量，虽然年近六十，却德不高望不重。应星这些后文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对“新三代”有过敬仰，至少是赶超的对象，如今失望之至，自然语词激烈。

市场经济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内在的伦理感。这与“新三级”受的教育有关，喝狼奶长大，身上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感。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弑父情结，儿子长大成人的标志，便是杀死父亲，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归的倾向。父亲一代的压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热、阅读热，将民国一代人说得花好桃好，虽然有将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倾向，但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那代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机会深度接触过那代知识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强调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但总是有比自由独立更高、更神圣的东西，一旦集体和国家的目标与自由发生冲突，就会牺牲个人的独立性。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似乎刚好倒过来，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而9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我们这代人的毛病在于虚伪，那是一种“真诚的虚伪”。有一个很出名的老三届知识分子，90年代股票热的时候，决定也要挤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换成下一代人，会大声张扬，觉得很正常。但这代人不行，非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这位知识界名流对朋友说：“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我们一起筹资炒股票吧！”你说他虚伪，他还真信这个，尽管这种信的里面有虚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当化。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次知青热，曾经在北大荒、大草原、云南下乡的知青，后来又考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开始怀念上山下乡那段岁月，苦难的经历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办一个展览，展览的都是文革期间留下的青春焕发、战天斗地的摆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里大谈青春不悔。现场就有同样从北大荒回来的、如今已经下岗的同龄人，尖锐地责问他们：你们当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们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当知青一代中的极少数成功者弹冠相庆，一切苦难最终成为温存的回忆，他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他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参加的77级高考，100个考生人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录取，淘汰率最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我们这代人毕竟受过启蒙思潮的影响，民主的观念根深蒂固。毕竟不是在90年代后的世俗化环境下生长起来，大部分人不特别爱钱，虽然有些人爱权势。我们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世俗生活是被压抑的，也没有觉得物质生活有多大的快乐。他们

的追求是集体性、国家至上的，这就潜伏着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当我们这代人即将退休，前途已定，无所牵挂的时候，可能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们这代人在退下来之前，都能做一两件对得起我们时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对时代、对人民的最大的感恩。爱权不要紧，要紧的是掌权之后，是否为国家 and 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当官的同时代人，在位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慎言慎行。从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倒是慷慨激昂，体制的毛病比谁都看得清楚。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甚至还不如党代会、人代会有差额选举。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三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 原载《许纪霖之窗》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